

# 全球化视野下的国际移民女性化趋势研究

李元

[内容提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女性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女性经济和政治地位不断提升,女性移民呈现前所未有的活跃。国际移民女性化趋势不仅关涉未来全球人口流动的总趋势,而且对各国战略和国内政策制定带来深刻影响。当前国际女性移民的“知产阶级”特点、“老龄化”问题、“贫困化”问题等现状,促进国际女性移民与女性主义运动和社区的紧密结合,积极参与到更为广泛的“后资本主义”新阶级力量的发展中去,推动西方左翼新阶级力量的成长。

[关键词]知产阶级 女性移民 后资本主义 新阶级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2)05-0112-05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人口的跨国迁移已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显著特征。在21世纪日益汹涌的跨国迁移浪潮中,女性的跨国迁移活动尤其引人注目。目前,女性的跨国移民已经超越家庭的私人空间,成为社会公共生活的热点话题。这股国际女性移民浪潮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运动密切相关。西方女性主义如何顺应时势地参与女性的国际移民趋势已成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妇女问题研究的前沿课题。

## 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与全球化下的国际女性移民

随着全球化日益深入,21世纪的女性社会精神生活在西方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政党政治综合影响下,更加显示出其独特的历史特征。在拉美、中东和印度等地区,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妇女经济权利的影响主要围绕三个方面:(1)女性力量对国家政策的重要意义;(2)女性参与政治决策的多样化方式;(3)全球女性的贫困问题、家庭暴力问题、自由问题及金融自主问题等。这三个主要方向中,女性移民伴随当代西方女性主义运动而成长变化,显示出内在的新特征。

第一,全球化下女性主义运动对同性恋和少数族群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包容,日益冲击传统女性观和核心家庭内涵,两性婚姻面临考验。

在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促进下,多元文化主义是近20年来活跃于美国学术界、教育界和政治界的一种政治社会理论,从其内容范畴来说涉及

政治理论、文艺理论、女性主义、民族主义、文化研究和教育等多学科领域。一般来说,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体现在哈贝马斯的宪政民主思想、C.泰勒的“政治承认”和解构主义理论三个方面。在以上思想指导下,多元文化主义还围绕少数民族和其他亚文化群体的“承认”和“平等”问题提出了种种要求。如美国主流社会白人男性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少数族裔和妇女凤毛麟角,这种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不承认”,是一种不公和霸权。另外,多元文化主义认为,性取向是个人生活方式问题,旁人无权干涉,要尊重同性恋者的权利,承认其婚姻权。在性别问题上,多元文化主义者与女性结成天然盟友,共同向父权制和男权话语系统进行挑战。基于这些认识,多元文化主义对“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极为支持,他们不仅要求主流社会承认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差异性,而且要求享受所有的公民权利,使得他们既保持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文化特色,又做一个完整的公民;另外,他们还希望借助政府政令和国会立法,让女性和少数族裔在就业、晋升、银行贷款和获取合同方面得到优先考虑。

随着女性主义这个200年前国际妇女运动直接产物的发展和进步,现如今的女性视角成为既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又在理论上兼收并蓄日益多元化发展,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支强大的左翼力量。《新美国媒体》(New America Media)一份名为《女性移民:21世纪家庭的管家》报告中,一共采访了1002位各族裔的女性移民,其中包括100名来自中国的女性移民。调查显示,这些中国女性移民认为美国社会比较包容,但

她们面临语言、医疗保险、职业生涯等诸多困难。除此以外,移民经历使得这些女性逐步改变了在家庭中的角色,比以前承担更多的家庭生计重任,在家庭重大决定中也更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家庭角色方面,71%的受访者表示她们来美国后,在家庭中更加果断、自信。19%的人表示在中国时自己是一家之主;62%的人认为在中国时丈夫是一家之主。现在,27%的人表示自己是一家之主,70%的受访者表示家中的财政是自己做主的,86%的受访者对于孩子的数量有决定权。

的确,在左翼力量的推动下世界范围内虽然越来越多的女性从政、进入议会、扮演立法者的角色,女性进入公务员体系或担任法官也越来越普遍,而且对同性恋和少数族群权利保护的立法也不断推进,但是现实总是更为复杂。潜在问题是:如果握有权力的女性或族群主观上抑或客观上依然接受、附和男性的、主流的价值观,则面对全球化的文化碰撞,本土法律文化如何应对世界多元文化的挑战,就成为当代学界不得不直接面对的现实理论问题。它提出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更恰切地诠释女性内涵的新要求。

第二,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市场环境中与女性主义“共谋”,在强大的男性中心主义压力下,不断模糊和淡化女性“社会性别”,忽略女性移民的政治诉求。

女性主义在资本主义危机和当前政治重组背景下的发展进行重新定位,标志着从新自由主义转向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企图,具有复兴女性主义解放承诺的前景。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认为,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提供了分析性别正义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三个清晰的维度。<sup>①</sup>但是,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由于处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盛行的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地受到新自由主义过分推崇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的影响,要想让女性发展走向更为健全的未来,就必须摆脱这种“共谋”关系的桎梏。

在西方女性主义对性别意识形态批判的过程中,文化建构主义特别针对20世纪60年代从美国兴起的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所带来的女性男性化的严重后果进行批判性反思。针对男性中心主义对于女性的政治和思想统治,文化建构主义的焦点和目标从文化领域继续转向性别问题研究,也即性别政治和性别差异等问题的扩展性研究,它的关键问题在于进一步区分了社会性别和生理

性别的意义。

所谓“社会性别”(gender),是指不同社会、文化赋予男女两性之间不同的社会角色、行为准则、表现形式及象征意义等,它与解剖学意义上的“生理性别”(sex)差异很大。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发起了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与男性争夺话语权的斗争,这是女性反抗“生理性别”方面非主体地位的战斗,与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密切相关。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协调、经济复苏和发展,政治民主的黄金时期在西方文化上的具体反映,促进了这一时期以颠覆和解构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为核心的西方女性话语和文学批评等文化政治主题的研究,从而使社会逐步趋向关注“社会性别”等研究。这一研究规模和影响之大是后来所始料未及的,20世纪70至80年代的西方女性主义发展研究不仅成为当时学术界一个令人瞩目的政治文化流派并影响了全世界。

然而,当代国际移民发展中出现的女性移民新趋势暗示了这个研究内容正在发生微妙的转移和改变。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流行现象,“中性美”审美旨趣正在波及整个社会,现代年轻女性甚至将是否具有“性别中性化”视为时尚与否的显性标志。大众文化甚至将“中性美”等同于全球化的建筑、雕塑和绘画等简约风格的艺术审美旨趣。“性别中性化”借助现代媒体、网络科技、时尚包装,迅速拓展至全球,成为大众口耳相传、竞相追逐的审美旨趣。这些都意味着女性主义运动如何从引领文化生活领域入手构建女性跨国移民的精神归宿感是全球化下的机遇和挑战。

第三,西方女性主义运动重塑了女性移民的自主性,但女性移民的这种自主性依然受到来自全球范围内西方保守主义的强大抵制。

尽管国际劳动力市场内在结构的变化,推动了女性的国际流动,为当地的经济、政治作出了巨大贡献。保守主义者却依旧借助西方传统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的惯性力量约束女性的独立意识和人格,他们受到在中产阶级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中强化女性取悦丈夫的责任。西方保守主义观点不断向社会强化,家庭才是发挥女性优势的最佳地点,女性比男性更适合从事一些服务性工作,对于家庭更具奉献精神 and 牺牲精神,女性自身似乎比男性也更愿意留在家庭。

伴随着世界范围内严重的金融危机,西方保

守主义以貌似同情和怜惜女性的姿态出现,以保护弱势群体的口吻使女性自愿选择回归家庭的观点,其实质是新一轮父权政治文化的复兴。全球化背景下,经济社会的高速不平衡成长期引发的经济危机使得女性回归家庭的选择中蕴含潜在的伦理问题。一项亚洲社会学调查发现,一部分女性,其中不乏高学历女性,自愿放弃学业和事业回归家庭。这部分被视为活力充沛的25至35岁女性心理问题也最多,其中,学历高和专业性强的年轻女性,更会因工作上承受额外的精神压力而使情况更为严重。<sup>②</sup>这些女性群体除了接受过高的压力指数外,她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比同龄的男性更脆弱。社会学家认为,这种看似柔弱无助、易于让步的性格,也许是女性对当今经济社会模式的一种取巧心态:假如无法消解男性社会中的巨大压力,女人只得以强调“我是弱者”的外在方式找寻自我认同。事实上,“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方式正如《女权的辩护》一书作者玛丽·科尔斯通克拉夫特(Marry Wollstonecraft)的分析那样,其结果必然牺牲女性的身体健康和精神自由,使女性只能活在男性提供的有限空间和时间中,成为“羽毛族”。<sup>③</sup>这样的女性,身体和心理羸弱,逐渐丧失在家庭中的决定权,失去在社会教育中锻炼理性的机会,最终表现得更为非理性和情绪化。经济上,她们不要求经济独立,但要求掌握家庭的经济收入和支出权利;政治上,她们不明确主张性别平等,甚至对于国家事务和女性的民主权利明确不主张;在文化生活中,她们则普遍接受西方消费主义理论。

第四,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中的策略本质主义成为女性移民身份政治的新型策略方式。

西方酷儿主义理论(Queer Theory)认为性别身份的存在是偶然的和经话语构建的,并会在21世纪回归传统文化的世界趋势中进一步寻找它们适合的伦理根基,从而成为女性主义运动中女性身份政治的一种新型策略方式,即策略本质主义。

“酷儿理论”中的“酷儿性”(Queerness)指的是难以进行分类的女性或男性。自称“酷儿”的人不止是具有男性气质的女人、女性气质的男人、同性恋或易性者,还有很多难以归类的人。这些难以归类的人的身份成为模糊的、可变的和偶然的。女性身份政治中出现一种新型策略方式,与全球化开启的新一轮反本质主义和反正统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浪潮密切相关。目前,“酷儿理论”的

出现因使性别内部变得多元化而日益受到全球化时代女性主义者的格外青睐。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酷儿理论”由于重视强化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社会建构性,作为弥补保守主义一直以来的男权主义印象,具有日益增加的受众基础,已经引起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极大关注。

## 二、女性主义运动背景下的国际女性移民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策略变化,女性的多元文化特征及其生存空间不断受到重视和拓展。国际范围内的女性移民现已成为国际移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发展趋势。正如澳大利亚学者斯蒂芬·卡斯尔指出,移民的女性化是当代移民的一个趋势,从2004年这种趋势就逐渐开始明显。《世界调查》曾重点阐述了从性别视角而言的全球化的一个关键层面,即国际女性移民的增加。在发达地区,女性移民比例达到了51%。国际女性移民这个问题在当今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移民也受到来自女性角色和移民角色的双重挑战、全球化和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共同影响,因此呈现更为复杂的问题和特征。

第一,国际女性移民中“知产阶层”崭露,成为全球化背景下新阶级的代名词。

国际移民女性化的“知产阶层”(Cognitariat)特点,主要指的是女性移民的知识分子趋势。罗伯特·莱奇(Robert Reich)在《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中把“符号分析家”定义为新统治阶级;12年后,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用“创意阶级”代替了它,认为所有重要的社会资源都流向这个阶层;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在柏林墙倒塌后则提出知识工作导致“后资本主义”的新观点;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也在《权力的转移》中深入分析了世界权力格局将极其快速地向“知识”转移的新趋势。后资本主义社会学家认为,资本家们已经感到他们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的原因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新生的“知产阶层”。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女性移民的高知识化水平突飞猛进,女性已然成为年轻一代移民新生阶层的核心力量。她们掌握知识,并有能力将知识转化为资产,对知识进行自由管理。全球化的女性国际移民中高等教育的

接受者越来越适应知识经济中的工作方式,但其独立性和社会保障都已遭受很大削弱。这里蕴含着未来西方左翼需要依靠和研究的新阶级的巨大能量。

第二,在多元文化主义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不断冲击下,尽管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绝对收入较十年前普遍上升,女性移民的“贫困化”问题却更加突出。

在瑞典马尔默(Malmö)举行的第五届欧洲社会论坛(European Social Forum,ESF)关于女性主义的诉求,显示出新的欧洲女性主义思潮正在努力探索女性主义理论在全球化浪潮背景下,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本土化道路和使当代女性主义从父权文化中解脱出来的途径,旨在进一步认识父权制及其与权力和金融自主之间的关联。2010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的第六届欧洲社会论坛也继续关注金融危机下女性主义的发展状况。目前的国际移民中绝大多数是女性。女性在适龄就业时,就业率低、退休早、收入少,在就业和职业培训方面依然存在性别隔离现象,容易受到年龄和性别的双重歧视,因此更容易处于贫困化、边缘化的不利地位。据英国《泰晤士报》2012年7月1日报道,英国政府正在修改移民考试内容,新的移民指导手册中将增加大量英国的历史文化知识,同时删减有关申领福利和保护人权方面的指导内容。<sup>④</sup>这主要针对来自亚洲和发展中国家的女性移民,有弱化女性移民社会保障的嫌疑。美国的境况也基本相同。有报道指出中国女性在美找工作最难。移民到美国的中国妇女来到美国后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找工作。在受访者中,有35%的人表示,她们在第一年内根本没有找到工作;20%的人花了四个月到一年的时间找到第一份工作;还有45%的人很幸运在头三个月就找到了工作。49%的人在國內所做的是白领工作,但在美国只有24%的人从事白领工作。福利和人权方面的无知更是加剧了女性的困境。医疗保险问题在这些移民家庭中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59%的受访者购买私人医疗保险,24%的人拥有联邦或是加州健保计划,另有15%的人根本没有保险,还有65%的人根本不知道可以在医疗方面得到政府资助<sup>⑤</sup>。

第三,国际范围内的女性移民“老龄化”问题。

当今世界上许多工业化国家正在经历着快速

的老龄化过程。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老年人口的比重也开始有所上升。但是前者是“先富后老”,而后者却是“未富先老”,这将引发更为复杂的社会管理等问题。而这些国际女性移民也成为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中的新生力量,正在悄然改变西方社会各阶级力量对比。前面提及的《女性移民:21世纪家庭的管家》的报告中,采访了100名来自中国的女性移民。其中,18—34岁的有8人,35—49岁有27人,50—64岁的有45人,65岁以上有24人。由此可见,女性移民的老龄化问题已日益凸显。<sup>⑥</sup>联合国《世界人口老龄化:1950—2050》报告就指出,全球60岁以上老年人口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到2050年将占全球人口的21%,在数量上将超过15岁以下的年轻人。<sup>⑦</sup>因此,世界各国老龄化趋势直接影响各国移民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变化。一方面是老龄化问题的国际化,另一方面是各国的“少子化”<sup>⑧</sup>冲击,迫使各国的移民政策门槛不断降低。根据新加坡政策研究院公布的研究报告,2005年的老年人口支持率(即65岁以上长者对15岁至64岁年轻人的比例)是8.6。就算新加坡从2005年起每年引入六万名新移民,到2050年老年人口支持率也还是无法维持在2005年水平,会降至3.5。为了解决老龄化问题,在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促进下,新加坡政府在大选中就表示对移民的重视,承诺不断降低移民门槛,提高生育率。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暗中较量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移民政策。现任总统奥巴马呼吁放宽移民政策,提出“增强美国中产阶级的方法之一是改革移民体系”,以此作为促进美国经济发展的举措之一。

### 三、国际女性移民与新阶级力量

随着西方从竞争性资本主义逐步向中央集权统治的未来过渡,一个集权主义的新阶级出现的可能性正在增大。事实上,有效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战略很可能会建立在“劳工的力量”与“新阶级”的联盟基础上。在这个社会中,当前的“第三阶级”即新阶级的胚胎,对那些期待后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人而言,或许是一种信念。东欧的知识阶层认为,对他们来说更好的策略是为资产阶级的发展而奋斗,以便确保“自由专业活动”的特权,而不是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作持续的斗争。具体来说,在西方女性主义运动推动下,国际女性移民与新阶级力量相结合是积极的。

第一,国际女性移民中“知产阶层”的新特点,促进与“第三次新阶级浪潮”的融合,塑造更为多元的新生左翼阶级力量。

新阶级理论的第三次浪潮所探究的是知识的变动的性质,而这种新的类型的知识所有者也被认为具备一种对权力的自发要求正在扎根,这一类型具有“颠覆性”。当代西方新阶级理论所强调的是“知识”维度。这确实一定程度上把握住了西方社会中具有较高教育水平女性的独特性与相对优势。20世纪70年代关于“知识阶级”的文献将左翼知识阶层所谓的反资本主义文化看作是这一新的、以目的为中心的组织的核心,他们建构了一个新的意义系统并将其强加给社会权利,从而试图颠覆现有的权威体系。如今,我们生活在原有的阶级认同性解体和新的认同性可能将要重组的一个过渡时期。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识工作领域,女性移民的临时工作者承担了大部分工作(即使在欧洲、美国的大学也是如此),目前西方左翼已经认识到劳动的临时化所导致的整个雇佣劳动阶级的分割和分裂危险。那么,代表左翼的工会和政治组织如何在一个多元的雇佣劳动阶级对抗资产阶级雇主的社会中,面对社会、文化、民族分裂的冲突,都是工薪阶级的女性移民的未来期望,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第二,国际女性移民与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社区结合的社会干预,可以弥补西方左翼缺失的社会基础。

社区参与、集体和社会活动是女性主义干预社会实践目标的另一个方面。从社区角度来说,可以避免妇女局限于家庭圈子而与外界隔离,提倡社区,包括社会适应和互助小组、教育小组、支持小组。从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角度来说,女性主义运动提倡分享和积极参与,特别是女性移民希望寻求朋友、母亲的角色,可以用在自己国家里熟悉的方式、非正式的家庭和社区交流方式。这些小组有助于增强女性移民之间的凝聚力,构建新

的社会关系网,并以提高妇女的社会性技能为内容。从工作方法来讲,特别是针对女性移民,有待于发展并完善一种适当的、从对她们面临的问题的理解出发的干预方法。因此,一些在产前产后服务(助产士开展的工作、产后护理的人性化、陪护)、计划生育工作(女性健康中心)和育儿工作中应用的女权主义干预可以运用在针对女性移民的工作中<sup>⑨</sup>。

由此,全方位、综合地修补西方左翼在大选中丧失的社会基础就更具有实践意义。以女性为核心的家庭将与西方女性主义运动更为深入地凝聚在一起。所以,在全球化背景下,女性主义运动非但没有过时,反倒是与女性移民的民间组织相结合的新型女性主义运动走向深入发展正逢其时,大有作为。

注释:

① [美]N. 弗雷泽《女性主义、资本主义和历史的狡计》,载于《世界哲学》2009年第2期。

② 吴韦材《女性的平等及另类反思》,载于2006年3月8日《联合早报》。

③ [英]玛丽·科尔斯通克拉夫特《女权的辩护》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6页。

④ “英国修改移民考试重“爱国“轻福利”,参见新华网2012年7月2日。

⑤⑥ “美媒调查:女性移民中国妇女在美国找工作最难”,参见2012年5月16日中新网。

⑦ 林姗姗《国际移民的走势比较与动因分析》,载于《亚太经济》2003年第5期。

⑧ 日本近年“少子化”已成流行语,“少子化”是指由于出生率下降而造成的儿童数量减少的现象。这一现象已经成为一大困扰日本政府以及社会各阶层的社会问题。

⑨ C. Corbeil and F. Descaries-Bélanger, *La Maternité: un Défi Pour les Féministes*, *Revue Internationale D' action Communautaire*, No. 18, 1987.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文慧]